

找尋客家人

—評劉正剛著《閩粵客家人在四川》

唐立宗

中研院臺灣史所籌備處

劉正剛，《閩粵客家人在四川》，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共 352 頁。

四川也有客家人？客家人不是都集中在閩粵贛交界地區嗎？除了原鄉之外，後來客家人應該多半移民至臺灣或海外一帶吧！相信這是多數人對客家移民的基本印象，然而《閩粵客家人在四川》卻打破了這個迷思。作者劉正剛透過對清代閩粵客家移民研究，指出清前期有高達百萬的閩粵客家移民陸續入川，隨之引領原鄉的經濟活動，並重建基層的社會組織，使得近代的四川發展與客家移民開發息息相關。

一、論旨介紹

本書共分六章。第一章導言，作了深度的學術史回顧，一反過去大陸學人「閉門造車」式的研究報告。作者儘量搜羅了目前研究客家移民的相關課題，甚至是臺灣移民史的研究，藉此也突顯四川的客家人研究幾乎是無人問津的狀態。選題上將範圍定於清代四川閩粵客家移民，考量這些移民入川的表現方式與演變，並對羅香林《客家源流考》指出的四川非純客住縣僅有十三縣表示質疑。材料和方法上除了運用方志、族譜與檔案外，作者還到四川實地調查採訪，強調運用社會史與經濟史的結合研究。

第二章為移民動因與移民環境。移民的遷入與移出都有其時代背景的烙印，作者認為清初入川的閩粵客家人，基本上是屬於趨利性的

經濟移民，部分則為逃荒原因而遷川；由於明末清初四川遭受重大戰亂破壞，一時之間土曠人稀，正需要大量移民遷入，於是閩粵客家人隨著各省移民步入四川的腳步，紛紛落籍定居川省。尤其官方對於入川移民的種種優惠政策，更提供閩粵客家移民謀生求富的絕佳機會。與臺灣相比，同時期客家移民遷入臺灣的限制較大，清廷對臺灣的開發又採取消極性的態度，對移民而言，四川更具吸引力。

第三章論閩粵客家移民入川的規模及分布，這是相當棘手的課題。作者主張清前期閩粵客家移民多以家庭遷移為主，與單身冒險赴臺的移民趨向不同，表現上則以分段式家庭遷移、一次性舉家遷移以及裂變性家庭遷移的三種方式流動；更為特別的在於閩粵客家人還將先人骸骨入川遷葬，也與入臺的客家人有很大的分野。閩粵客家人始自康熙初年就出現大規模性的移川活動，到了雍正年間移民大舉紛至，於是雍正五年（1726）政府取消了獎勵措施。實際上朝廷並未禁絕人民入川，所以惠州、潮州、嘉應州等地仍然約有萬餘人入川。作者並估算清代康雍乾三朝，入川的廣東客家人應當有七十五萬人，若包括福建等地的客家人在內，移民人數將不會少於一百萬人。另一方面，閩粵客家人幾乎遍及四川各地，作者運用族譜、方志作了很多相關記述，並指出當地會館是閩粵移民在四川各地分布的有力物證。

第四章分析了閩粵客家移民的經濟活動，該章著重於閩粵客家人農業和工商業的展現。客家人在原鄉時即嫻熟於山地的開發，因此利用特有的耕作技術，使四川山地得到更廣泛的利用。同時諸如蕃薯、甘蔗、煙草、苧麻、席草、果木、藍靛等種植，都在閩粵客家人引進推廣經濟性作物下發展起來。作者接著論述這些農業移民的社會地位情況。在清初的四川環境，移民者大多成為自耕農，至少到乾隆年間，自耕農仍占四川農村人口的絕大多數。其中有部分的閩粵客家人勤力耕耘，最終上升至擁有一定土地的地主階層。當然，越到後期，隨著土地集中現象的日增，佃農比例也就由少到多，租佃關係跟著普遍盛行，四川押租制的盛行，主要就是大量外省移民入川佃耕而起的；又

巴縣是閩粵客家人定居的主要區域之一，現存的清代《巴縣檔案》仍可看出閩粵客家人在巴縣等地的招佃或租佃形式。

關於閩粵客家移民從事工商業的活動，本書強調客家移民充分發揮原籍的商品經濟意識，由於入川的動機正在於謀生致富，反倒不會拘泥在重農輕商的思想。其次，閩粵客家人歷經多次的大遷移，較少安土重遷的心理，與原有保守封閉心態的四川先民大不相同。況且閩粵客家移民從原鄉遷川，途經江西、湖南或貴州等地，有較豐富的商業情報知識，可方便於投入長途販運。還有閩粵客家人善於經商與一般都帶有數量不等的資金入川條件下，都共同構築閩粵客家移民從事工商業的優越條件。作者並以實例分析當中工商業移民比例、手工業活動範疇與其市場商業貿易的活絡現象。

第五章集中於討論閩粵客家移民的社會組織。最引人矚目的移民社會組織當以同鄉會館組織與以血緣為紐帶結合的家庭組織。根據作者的考察，四川有許多廣東移民會館稱為「南華宮」，其中供奉「南華六祖」，即佛教之六祖慧能。而六祖慧能正為廣東韶州人，就地緣上與廣東客家人的關係極為密切，所以廣東客家移民以六祖祭祀強化在川客家人之間的凝聚力；福建客家會館一般是「天后宮」或「天上宮」，崇祀海神天后媽祖，福建客家人祭祀媽祖不僅出於媽祖傳說源於福建，也在於媽祖受到歷代王朝不斷的封敕與推崇，因此突破原先海神界限，連客家山區也同樣有媽祖廟的出現。總而言之，清代四川閩粵移民會館至少有五百所以上，分布的州縣占當時四川州縣總數的 81% 以上，數量與規模皆相當可觀。

對於閩粵客家移民的家族組織，作者指出這些入川的家族組織重建時間很短，從原鄉入川到買地建祠的時間，大多是不滿百年，然這又與前已指出的家庭遷移形式與足夠的經濟實力有關。移民入川之始，基本上是以原籍唐山祖為祭祀對象建立祠堂，定居後漸轉為入川祖為祭祀對象，亦即先是強調只要同姓，均可出資參與祠堂的建立與

祭拜，繼則尋求血緣關係的牢固。再從閩粵客家移民對族譜的修撰與族產的設置來看，可顯示他們很快就完成與新居地四川的認同。

作者在第六章結語中再作了歷代移民遷移分析，旨在比較出入川這波客家移民的特徵。尤其是清代出現往東北、西南和臺灣的三大移民流向，而人口增長最大的西南地區之中，閩粵客家人入川又是構成這波移民運動的重要部分，不管是移民遷移動機、方向與做法都相當特殊。本章最後還有一篇附論，是作者對四川客家人現狀的短篇調查，當中並吸納部分民俗、語言學者的研究成果，可謂多方位的探討。

二、討論與期待

引發作者研究閩粵客家人入四川的動機頗為有趣，據該書〈後記〉所描述，1989年作者正在廣州中山大學歷史所攻讀碩士學位，親眼目睹當時各省民工如潮水般湧向南粵，激發作者對廣東福建人口外遷史的研究念頭。對筆者而言，本書的特色在於並不單就四川的客家人而論客家，經常透過客家移民臺灣的例子作比較，不但使讀者深刻體會入川客家移民的獨特性，也避免了建樹不見林的偏頗論述。

雖是如此，或許作者對於移民社會的解釋上過於簡單，難免會帶給讀者錯誤的資訊。例如，該書提到四川雖然移民來源相當複雜，但因為客家移民入川採取家庭式的移民策略，性別比例並未失調，所以比單身移民入臺所引起的社會來得穩定。（頁 335）但是臺灣移民社會的不穩定並非全是移民性別比例失調所造成，清代在臺的客家人身處於福佬民系與平埔族的聚落之間，於是各方經濟利益的爭奪成為衝突的導火線，也促成客家人採取軍事團保組織。（註 1）另一方面，四川土客衝突的不明顯，還與當地土著在清初不占優勢的地位有關。（註 2）

殊為可惜的是，作者並未更深入闡釋四川土客族群之間的相處關

係與其自我認同意識的演變，這若能與作者自詡熟稔的社會經濟史專長結合，當能妥當剖析出入川移民的特色。清代移民在不同的地域各有獨特的發展與處境，在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波動都牽動著土客關係。例如原先清代淮揚地區社會經濟較優，但隨著當地鹽業城鎮的衰敗與上海經濟重心的崛起，淮揚、山東等地移民紛紛入上海尋求發展，移民的漸增與經濟利益的競爭，最終導致一些處於階級地位較高的本地人對這些移民起了反感，於是特以「蘇北人」稱呼表示輕蔑不屑。Emily Honig 深入研究後發現：所謂的「蘇北人」不只是代表來自蘇北，而是一種社會分類，帶有社會階層的意涵。堪為玩味的是，當 1949 年後，大批上海人移至香港卻也得到相似的待遇。（註 3）而 Sow-Theng Leong（梁肇庭）也曾成功地分析近代以來客家族群意識的轉變。起初客家民系在明代處於「醞釀期」的蟄居，其群體自我意識較不明顯；到了清代，隨著當地經濟週期循環的起伏，時與相鄰福佬、廣府人摩擦衝突。客家先民開始往外開發擴張，往東跨越韓江流域上游，向南佔據嶺南地區東江、北江流域的中上游，朝北於贛江流域各地定居，同時還抵達屬於湘江流域的耒水，他們位居各水系流域上游，更能夠控制支配相鄰區域的城市與經濟活動，藉由逐步強化的經濟力量，可以投射於文化、社會與政治的參與活動，同時更能團聚族群間的認同意識，而轉型成為顯著的文化群體。（註 4）在四川，最大的移民地是來自於湖廣，次為閩粵，處於未占大多數的客家群體自我意識是如何調適，仍值得多方探求與解答。

本書之中，筆者最有興趣的部分是作者如何分析閩粵客家移民入川的規模與分布。誠如前述，這是相當棘手的課題。本書並以閩粵客家人占各省入川移民總量 25% 估算，乾隆五十六年（1791）閩粵客家人的人口總量至少約為二百一十萬人左右。較為不解的是，作者指出以「家庭遷移為主的向四川遷移人數一定會多於遷臺人數」，又說明康雍乾年間每年入川的廣東客家人應有三千至萬餘人不等，（頁 94-100）可是據清康熙五十年（1711）臺灣知府周元文的看法：「閩、廣之梯航日眾，綜稽廣籍，每歲以十數萬計。」（註 5）顯然低估了客家人的遷臺人數。

再者，作者依據史料《蜀故》的記載，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間（1753-55），入川民人湖南最多，計四、四六三戶；廣東居次，計一、二七九戶；江西計五百三十四戶，居第三位；福建則十七戶。在原書頁 96 從表 3-1 閩粵客家人家庭入川人數列舉表中概估，每戶約為八·五人，於是得出這三年閩粵移川戶數有一、二九六戶，人數達一萬人以上，每年入川人數當在三千以上。然而，《蜀故》並未將這些移川的家戶指明為客家人，這樣估算自然是很難令人折服。

最後，綜觀全書，內容絕大比例是討論清代的閩粵客家入川移民發展，對當地客家人的現狀則僅十餘頁的篇幅附帶論述，若單就《閩粵客家人在四川》書名而言，顯然未有適度的全面關懷。（註 6）當然，就一本好書而論，筆者百般的苛求顯得過於挑剔。客家學研究確實要朝向如同作者紮實的論述分析，也期待作者能更上一層，能將江西等地移入四川的客家人研究，早日帶領到讀者們的閱讀世界。

註 釋

- 註 1 其中以屏東六堆最為明顯，參見林正慧，「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庄之演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 註 2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第六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頁 107-108。
- 註 3 Emily Honig,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註 4 Sow-Theng Leong(梁肇庭),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關於梁肇庭專著，可參見筆者刊載於《新史學》11：1（2000），頁 189-200 的書評。
- 註 5 〔清〕周元文，〈申請嚴禁偷販米穀詳稿〉，收入〔清〕周元文編纂，《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6 種，清康熙五十七年重修本，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卷 10〈藝文志·公移〉，頁 323。
- 註 6 對四川客家人有興趣的讀者或可參見孫曉芬的作品：《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四川的客家人與客家文化》，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0。